



长

征

放眼看

FANG YAN KAN CHANG ZHENG

叶心瑜 著

红旗出版社



放眼看

FANG YAN KAN CHANG ZHENG

叶心瑜 著

长征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放眼看长征 / 叶心瑜著.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06.8

ISBN 7-5051-1458-1

I. 放…

II. 叶…

III. 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1936) —史料

IV. K2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0951 号

放眼看长征

叶心瑜 著

责任编辑: 关健 封面设计: 孙翠之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100727 地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E-mail: hqcbs@publica.bj.cninfo.net

编辑部: 64068163 发行部: 64037154

印刷: 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16 印张: 21.5 字数: 547 千字

ISBN 7-5051-1458-1

定价: 3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毛泽东等看长征 (1)

毛泽东对长征永志不忘 毛泽东为《长征记》征稿写公函 点将张闻天 周恩来弥留之际,想听《长征组歌》 朱德评说长征 张闻天评长征 徐向前的见地

第二章 外国人眼中的长征 (8)

想不明、讲不清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 “他们的领导者是谁?” “中国专有的故事” 红军长征到底走了多少路 “举世瞩目的奇异事件”

第三章 毛泽东赋闲 (31)

三次挥师:三万胜三十万 毛泽东被撤党职军职 “乞丐和龙王比宝”——“左”倾领导人的战略战术 蔡廷锴等揭出正义之旗,毛泽东表示赞成和支持 飞扬跋扈的奥托·布劳恩 毛泽东寻求周恩来的支持 毛泽东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邓小平等也挨斗 刘伯承批评布劳恩的帝国主义行为

第四章 序 幕 (47)

“长征”一词的由来 红军能胜吗 红军终于失利 红六军团西征,揭开长征的序幕 毛泽东、周恩来回答为什么要长征

第五章 “三人团” (54)

长征名单中没有毛泽东 主席无权过问下属去留 毛泽东伉俪舍爱子上征途 蒋介石下庐山商对策 蒋介石师法曾国藩,步步碉堡为营 毛泽东入“红安”,贺子珍入“红章” 彭德怀喜得宝书 毛、周、朱争取“南天王” 蒋介石的“抽干水池,捉尽活鱼” 蒋介石悬重赏缉拿朱、毛

第六章 湘江惨败 (72)

蒋介石部署第四道封锁线 “左”倾领导拒绝正确建议,导致红军血染湘江 湘江战役惨败之谜 蒋介石布下口袋阵,毛泽东力避红军覆没之险 毛泽东据理力争,通道会议决定红军西进入黔 红军避开“口袋”连克数城,指战员中盛传“李德是饭桶” 猴场会议决定进军遵义,剥夺博古、李德对军事的“独断权”

第七章 历史的转折 (80)

蒋介石派军入黔:一箭双雕 红军势如破竹抵乌江 工兵架“浮桥”,“天堑”变通途 红军智取遵义,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三人团”反“左”倾军事路线,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会后读《孙子兵法》

第八章 得意之笔 (94)

针对蒋介石新部署,毛泽东等决定渡长江 朱德亲临前沿指挥土城战斗 结束土城战斗,一渡赤水西进 林彪对遵义会议态度暧昧,毛泽东在猿猴渡口向一师传达会议精神 博古在“鸡鸣三省”交权张闻天 红军二渡赤水,蒋介石不知所向 遵义战役红军大胜,蒋介石大骂何应钦怕死 红军三渡赤水,蒋介石重演“碉堡战术” 红军四渡赤水,摆脱蒋军“围剿” 毛泽东出任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 毛泽东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第九章 红军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 (108)

红军佯东实西,甩掉敌军 贺子珍为救伤员负重伤 毛泽东挥泪看望贺子珍 龙云“送礼品”,解红军燃眉之急 毛泽东部署佯攻昆明,红军暗渡金沙江 林彪要毛泽东下台,会理会议维护毛泽东领导 蒋军悲叹失败,称红军是“天兵天将” 毛泽东谈笑过铁索桥,赞突击英雄创奇迹 徐向前致电党中央毛主席,欢迎中央西征军 为团结张国焘,周恩来辞去总政委 魔草地

第十章 “彝海结盟”传佳话 (140)

中共民族政策的胜利

第十一章 惊心动魄的一幕 (152)

毛泽东等三电张国焘促速北上,张国焘拒不执行 包座战役获重大胜利,红军打开通向甘南之门 毛泽东等再电催张国焘过草地并决定派团接应 张国焘接连电令陈昌浩,要右路军南下 张国焘企图谋害中央,分裂红军 叶剑英带军委直属队“开大差” 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俄界会议 确定长征落脚在陕北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赠诗彭德怀 毛泽东纠正错误肃反,指挥直罗镇战役

第十二章 法宝 (182)

瓦窑堡会议的重要决议 中共联蒋方针始于何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

第十三章 阎锡山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195)

红军渡黄河,突破阎锡山的防线 在山西建立临时根据地 蒋介石一面派兵赴山西打红军,一面派密使同中共商谈联合抗日 毛泽东决定派周恩来同张学良会谈 毛泽东透辟分析张学良 毛泽东赴前线指挥兑九峪战役,重创阎军

第十四章 智斗马家军 (208)

蒋介石调军围攻陕甘根据地 毛泽东、周恩来等发布西征战役计划 毛泽东给蒙族上层人物写信,争取共同抗日 打是为了和 支持陈济棠、李宗仁抗日 党中央机关从瓦窑堡“迁都”保安 瓦窑堡由东北军占领为上策

第十五章 团结为重,胜利会师 (219)

张国焘另立“中央”,自封“主席” 毛泽东等以团结为重,坚持争取张国焘北上 张国焘攻击党中央、毛泽东等人,继续吹嘘南下胜利 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表示同意率军北上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中

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 张国焘又变卦,提出向西北进 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毛泽东赞扬贺龙等领导人 毛泽东心中石落地,蒋介石得意算计失算了

第十六章 张国焘四面楚歌 (229)

张国焘公开叛变 红二方面军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徐向前被蒙在鼓里

第十七章 艰苦转战先期到陕 (235)

要不要战略转移 奉命长征 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西征北上 蒋介石五道电令督饬“围歼”红军 回民区留下好影响 进入陕北 毛泽东借钱《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毛泽东说:闹华山,配合得好

第十八章 艰苦征战历经曲折 (255)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激战千佛山 松潘争夺战 樊功会师庆胜利 爬过长征中的第一座雪山 征服茫茫草地 包座战斗的胜利 百丈战斗失利 张国焘南下方针是死路一条 第三次长时间过草地 陈昌浩反对张国焘再搞分裂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于会宁

第十九章 万马军中韬略筹 (275)

红二军团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撤出洪湖革命根据地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团结“神兵” 战略转移 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 红二、六军团长征 毕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转战乌蒙山区 抢渡金沙江 蒋介石飞昆督战 无济于事 不忘旧情,策应战友 踏破连天雪 甘孜会师知真情 “走出草地就是胜利” 会师将台堡

第二十章 惊人之举 (299)

“西安事变”前的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第二十一章 蒋介石败在谁之手 (307)

蒋介石与“云南王” 龙云空中虚惊 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小偷式的袭击”,蒋介石失人心 龙云大骂蒋介石 卢汉起义,龙云回京 “剿共常胜将军”投入人民怀抱 “立煌县”只是虚名 蒋介石与“南天王”陈济棠 “南天王”不如孔家一条狗

第二十二章 得人心者兴,失人心者亡 (324)

统一战线是我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 首先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实行“红白通商”,经济互利 欢迎看戏,交流感情 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密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 对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展工作 通过周素园团结一批开明人士 败军之将也有人才 礼遇一活佛,影响宗教界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个合适人选

结束语 (337)

第一章 毛泽东等看长征

毛泽东对长征永志不忘

毛泽东于1935年刚到陕北不久，就对红军长征的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她的领导机关，她的干部，她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151页）

毛泽东为《长征记》征稿写公函

1936年8月初，红军三大主力即将大会合的形势已经形成，毛泽东即与杨尚昆联名向参加长征的原中央红军，时为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发函。函称：“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个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到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毛泽东书赠“长征”诗

1936年与毛泽东见面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即将来到，毛泽东非常高兴。与世隔绝几年，“赤匪”已经濒于死亡的传说，不胫而走。如何把红军以及红军长征的情况和胜败告诉世人呢？这是最好的机会，他等待这位记者的到来。当他接到周恩来发来的电报，得

知斯诺即来保安的消息起，他就等着斯诺到来。会面那天，毛泽东在门口迎接他。他和斯诺谈了好几天，谈了抗日，谈了个人，谈了共产党，谈了红军，谈了他的同事，谈了长征，谈了统一战线，谈了共产党的政策，谈了与国民党的关系，谈了人民，谈话包罗丰富的内容。

斯诺在红色区域经历了四个月，临走前又去看了毛泽东。毛泽东又回答了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临别时，应送斯诺什么呢？毛泽东考虑着。最后，他为斯诺手书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体诗。长征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的确印象太深，永世不忘。如果没有长征，没有遵义会议，没有四渡赤水，没有巧渡金沙江，没有彝海结盟，没有强渡大渡河，没有东征，没有西征，没有抗日纲领和行动，没有三大主力会师，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法宝，特别是没有遵义会议和统一战线的法宝，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以及他个人又会怎样呢？

赠礼仍是“长征”诗

新中国建国伊始，中共中央从各地抽调干部充实新区各地政权。1949年9月，中共长春市委书记朱光奉调到广州工作。这位在抗日烽火初起时曾任第十八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秘书长、才华横溢的老同志，趁路经北京南下履新之便，特地登门拜访他的老上级朱德总司令。在朱德家里，朱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十分潇洒。一天清晨，他正和朱德在庭院中散步，住在隔壁的毛泽东悠闲自得地信步走来，一眼瞥见朱光不觉一怔。未等朱德开口，毛泽东便爽朗地问道：

“你，是哪一个？”

“我，朱光是也。”朱光答道。

“好，你好，朱光……你还认识我吗？”

“哪个不认识你——中外皆知的伟大人物，鼎鼎大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那么，你为何看朱总司令而不看我？”毛泽东又问。

“因为我与朱总司令同宗、同姓，宗派山头。”

“你既然把我划外，难道你不怕我见外，把你忘记吗？！”

“你忘不了我朱光！”

“为何忘不了？”

“因为我还没有给你演出《奥赛罗》呢。”

毛泽东听罢开怀大笑。

朱光自知“理亏”，应毛泽东之邀，来到他的住处。

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当朱光看到那琳琅满目的各种典籍时，情不自禁地手痒起来。

毛泽东猜透了朱光的心思，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道：“你这个朱光，还想夺几本书吗？”

“岂敢岂敢。”朱光连声答道。

二人侃侃而谈，回想起12年前1937年在延安共争书帖的往事，不禁哑然失笑。

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之后，一位青年作家从五台山奔赴延安的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得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四册名著和《石索》、《三希堂残帖》各两卷，如获至宝。虽经朱德总司令多次通令轻装，他始终爱不忍释。到达延安经朱光引见，这位作家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虽与这位青年作家萍水相逢，却似故人邂逅，竭诚欢迎，殷勤款待。一瞬间，青年作家感动不已，不禁激情暴发，将挎包内未曾释手的名著、字帖一股脑儿地掏了出来，全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连连称好。谁知站在一旁的朱光手疾眼快，一把将莎士比亚的四本名著夺了过去。

“岂有此理！”毛泽东勃然大怒。

“见面分一半……”朱光强词夺理，面无愧色，振振有词地说：“字帖先不说，剧本应该归我。”

“谁说应该归你？莎士比亚是一代戏剧大师。马克思喜欢读他的书，他的二女婿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家中有一种真正的莎士比亚崇拜热。他的小女儿说莎士比亚著作是家里的‘圣经’。我毛泽东不是教徒，莫非我不能读‘圣经’吗？……固然也有人反对，拿破仑说，莎士比亚的杂剧是不可读的，是可怜的。至于我，我主张公道，马克思正确！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徒，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所有权问题，怎能与你朱光善罢甘休？”

“我是南国社元老，当然有权决定莎士比亚的剧本归谁。”

……

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青年作家手足无措，连忙调停，结果是平分秋色。朱光强行夺走了《奥赛罗》、《李尔王》以及《石索》碑帖。

“这样分配合理吧？！”朱光拿着夺到手的书问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一眼这位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朋友，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权既在你，我只得服从。但我要问你，你既然是南国社元老，而今还能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吗？”

“你听我背诵独白……”朱光不假思索地说。脱口而出的朗诵，生动深奥，感人肺腑，语言节奏疾徐有度，声音抑扬顿挫，以及表演的神态，完全恰到好处，唯一不足之处是夹杂着浓重的粤音。“你的口语不够国语化……”

“我的表演，超群出众，精妙绝伦……”

“如此说来，你演出《奥赛罗》，我必到场欣赏，领教……”

“岂敢岂敢！”

书和帖就这样被朱光夺走了一半。

二人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畅谈起来。朱光乘兴抒情，书诗一首：

四载风云塞北行，肩钜跋涉愧才浅；
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

落款署“朱光于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古都中南海书法家之府。”毛泽东看罢提笔对个别单字作了修改，将“法”字改为“癖”，把“府”字改为“家”。

朱光见此不以为然地说：“主席，何必如此。过不了几日，你就是一国之主了。我尚且故隐其讳，否则，我不该写‘主席府’了吗？”

“你这个朱光上皇，你要给我加冕而称为王吗？朱光，我们出身草莽，不可忘本！明天也罢，明年也罢，千万代也罢，你我始终如一，要祸福与共，甘苦共尝，同称同志，同叫背枪的、当兵的。多少年，我们当兵的，来无踪，去无影，行无定所。时至今日，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胜利了，有了‘家’。我指的不是书法家之类的‘家’，这个‘家’、那个‘家’，只是说以‘府’称‘家’的‘家’，人生一世，保全一‘家’，足矣、足矣……”

毛泽东说着，百感交集，声色俱厉，显然，这是毛泽东特意在表示他的义正辞严。他意犹未尽，欣然命笔，为朱光草书旧作《七律·长征》诗一首，“附赠征人”：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点将张闻天

1950年1月8日，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联合国去电，提出派遣新中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以代替国民党代表的要求。新中国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应由谁来担任，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呢？原拟派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出任斯职。周恩来感到章汉夫资望不够，只能充当副手，首席代表还需另行物色，提供毛泽东考虑。当时在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的毛泽东，反复思考人选问题，颇费周折。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于1月18日给刘少奇发去电报，认为出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以张闻天为宜。电报特关照，新华社发布这一消息时，必须介绍张闻天的生平，要写上他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各项革命工作。毛泽东在这里，把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衡量一个人资高望重的重要标志之一。

1962年4月20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5年，经历转战陕北、解放战争，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繁忙岁月同毛泽东朝夕相处的卫士长李银桥，要调离中南海，到天津去工作。富于感情、怀旧特浓的毛泽东，眼看形影不离的卫士长行将离去，心中真是依依不舍。为了感谢李银桥多年来对他的照顾，也为了预祝李银桥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奋勇前进，他答应为李银桥题字留念。题写什么呢？毛泽东对李银桥亲切地说：“近来没作新诗，抄了一首旧诗送给你吧。”李银桥接过毛泽东书写的折子一看，上面抄录的仍然是《七律·长征》这首诗，他在自己写的几十首诗词中，又选中了《长征》，再次反映了他对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无比重视和念念不忘。

铭记长征，为了新长征

长征，在毛泽东脑海中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永矢弗谖，不是没有缘由的。长征，从1934年10月渡过清澈见底的零都河开端，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段历史的头和尾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以后，毛泽东为了这个已成为“府”的“家”，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探索；毛泽东的未竟事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率领下，亿万中国人民又开始了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新的长征。

作为中国共产党、新中国、人民军队的领袖、奠基人、缔造者的毛泽东，深知长征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他本人铭记着长征，未曾须臾忘怀。中国人民永远铭记毛泽东在长征中建立的丰功伟绩。

在毛泽东纪念堂休息室的墙上，挂有毛泽东的《长征》诗。人们以此寄托对他的深切的怀念：感谢他带领全党、全军胜利地完成长征，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领导人民建立了新

中国。同时，也以毛泽东的《长征》诗，激励我们踏上新的长征的征途。

1977年12月贺子珍在上海得了脑血栓偏瘫，行动不便，在上海治疗一段时间后，转到北京治疗。贺子珍在北京治疗期间，曾要求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要求获准后，她终于在1978年9月18日来到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她在毛泽东坐像前献上花圈，上书：“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贺子珍在毛泽东坐像前停立许久，然后女儿女婿推着她坐的轮椅，围着毛泽东的水晶棺缓缓地转了两圈。她专注地凝视着安详长眠的老战友，眼泪沿着双颊徐徐而下。当她来到休息室时，面对毛泽东的《长征》诗，长久地凝望着，默诵着，与毛泽东一起长征的情景又历历在目，心中涌起了多少思绪……

周恩来弥留之际，想听《长征组歌》

作为两届“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由于疲劳过度，加上自然和人为的条件局限，他在长征中病倒了。沙窝会议后，不能进食、发高烧、昏迷不醒，经多日抢救治疗，才脱离危险。虽然险情消除，但身体仍很虚弱，以致1935年8月20日在四川毛儿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他却因病未能参加。周恩来在长征中险些送命的经历，对他印象很深。周围的同志对他也很关心，也很焦急。杨尚昆1978年11月上旬，当访问者问及这段历史时，他深情地说：“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才坐到椅子上稍加休息。等情况搞清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让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他自己承担起来。白天行军，晚上工作，铁打的汉子也经不住长期这么干。”周恩来在长征的那些日子里，常常彻夜不寐，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眯盹儿一会，抬起头来接着又工作。1935年7月到毛儿盖前，就已是带病工作。7月28日到毛儿盖后，他身体极度疲劳，又加上缺粮，只能吃野菜和青稞，病情进一步加重，终于病倒了。医生最初当做疟疾来治，病情未见好转，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蜡黄。王斌、李治两位医生检验后，确诊是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但在长征路上，缺乏医疗器材和药品，无法消毒，更无法开刀和穿刺，只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和从远处高山上取来的冰块冷敷他的肝区。组织上见周恩来病情沉重，只好把本来不与周恩来同行的邓颖超接来，照顾周恩来。经过医生、邓颖超和同志们的精心治疗和照顾，周恩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在排出半盆绿色的脓后，他的烧也慢慢退下来了。人逐渐清醒后，才发现邓颖超在他身边。周恩来就是这样带病过草地的。最使他难忘的是，彭德怀决定组织担架队抬他走出草地，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陈赓自告奋勇，担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参加担架队，抬周恩来走出草地。杨立三等干部和抬担架的战士们经过长途跋涉，加上缺衣少粮、少盐，冻馁交加，体质都已相当虚弱，少盐更使身体感到无力。他们深一步、浅一步地走在遍地是沼泽的草地上，稍不小心，就会被泥潭吞没。周恩来病虽重，但心里明白，他

看到这一切，心中难过，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无论如何也不让同志们抬着他。但身体已十分虚弱的周恩来，连平地行军也力不从心，何况是到处野草丛生、到处是泥潭的草地，加上气候恶劣、变化莫测，他靠自身力量无论如何也是走不出草地的。同志们硬把他抬出草地。杨立三的双肩磨破了，脖子一歪就痛，他咬着牙关，坚持下来，走出草地就病倒了。1954年，杨立三去世，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深挚的同志之情在抬担架和抬棺送葬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年后，周恩来于1936年9月26日在保安与斯诺的谈话中，又重申疾病对长征战士的威胁。他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最大的损失是在途经四川、贵州和西康的路上，与国民党作战的损失要少一些，最严重的损失是由于疲劳、疾病、饥饿等所造成。”上述这段话，不但是周恩来的亲身体会，也是他耳闻目睹的事实。英勇无比的红军往往不是牺牲在敌人枪口下，而是牺牲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敌人围追堵截的封锁下。

周恩来对长征印象太深，这不但是因为他在长征中险些送了命，更主要是他对长征的意义、在长征中的同志之情、长征精神的体会。因而在他临终之时，曾要求再听听《长征组歌》，但被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四人帮”拒绝了。只有参加过长征的人，对长征才有如此的深情。

朱德评说长征

1937年6月23日，朱德会见美国学者托马斯·阿瑟·彼森，回答他提出的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时说：“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依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

彼森回忆道，当我问朱德，红军长征中“幸存下来的人还有多少”时，朱德这样回答：

陕甘宁边区的9万红军部队，只有2万到3万是从江西出来的，其余大部分是在四川参加进来的。许多人倒在我们的身后，他们有的累死了，有的病死了，有的被敌人杀害了，还有一些仍在分散的游击区里。

长征损失非常惨重，可能高达30万人。1934年的高峰时期，在江西、福建根据地红军有20万人以上。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反共“围剿”中，我们的损失很大。这些损失主要不是由于蒋介石有美国飞机的轰炸，而是由于红军对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队，采取了正面攻击的错误战术。

张闻天评长征

张闻天于1935年12月1日写的《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中，称红军战略转移为“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远征”。他对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作了如下阐述：“这个宣言（指抗日救国宣言）在全中国人民前面，更充分的表示出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是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于一九三四年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且于同年十月红军主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远征，最后到达了抗日最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而这个宣言更加证明，中国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为了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因此，这个宣言一定可以取得全中国人民最热烈的赞成与拥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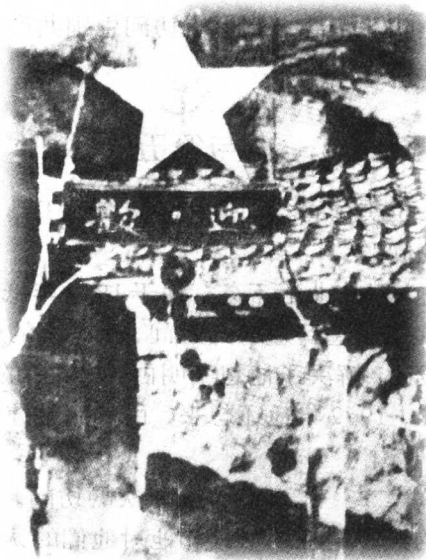
1935年10月22日，他在陕北吴起镇（今吴旗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

针问题。会上，毛泽东作报告，他作总结发言。在发言中，他明确指出中央红军长征宣告结束，中央必须实行战略转变，即“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

徐向前的见地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三个方面军会宁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会师后，毛泽东在会宁作报告，指出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战争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他强调了长征的重要意义，指出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长征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无敌的。毛泽东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的士气，也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二章 外国人眼中的长征

至今为止，外国人不管当年是否参加了长征，或者事后随长征路走过一段的，或者事隔半个世纪后，又踏着红军遗迹重走长征路的，或者受有关书籍启发的，或者访问过当事人的，或者只是道听途说的，他们都以长征为主题，给人们留下了他们的经历和评说。

西方新闻界中破天荒的大事

1936年6月，斯诺到陕北。红一方面军早已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中心就是保安。而红二、四方面军尚在长征途中，中央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共商大事，力求主力红军尽早会师于西北。共产党为了抗日，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他们已开始与东北军联系，共商抗日事宜。同时，共产党明确表态，要与蒋介石联合抗日。在这样历史背景下，斯诺到达陕北，亲自到保安访问中国共产党领袖，特别是同毛泽东面谈，这是西方新闻界中破天荒的大事。

第一次与第五次

1936年6月，西安出现一位美国青年，他在等待交通工具，要去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弄清他想不明白说不清的问题。

他就是埃德加·斯诺。他大学毕业后不久，便于1928年抵达上海，成为一名记者，其时年仅22岁。他原先计划只在中国逗留短暂的时间，但古老的中国却把他留下了13年。自他第一次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解决了他想不明白、说不清的问题后，他曾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前后竟达六次之多。1972年他还想来，由于病魔缠身，未能成行。1972年在他弥留之际，曾说过：“我热爱中国”。

有了第一次的访问，才有第二、三、四、五、六次的访问。这“一次”与“五次”之比，再好不过地反映出斯诺眼中的红军长征的形象和他对他们的认识与态度。同时也反映出，在红军长征壮举中，启发和促使他从一个富有同情心，带有自由色彩的西方记者，逐渐转变成为一名有正义感的进步记者和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

想不明、讲不清

1935年底，中国与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交叉在一点上，前途如何，斯诺看不出端倪。而又在这时，湖北省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对美国传教士夫妇，被中国人杀了，而且还砍了他们的脑袋。国民党乘此机会，大肆宣扬，指控共产党谋杀美国传教士。这件事使美国传教士一时异常恐慌，认为是共产党杀了传教士，于是结成一个恐“共”团体。甚至有人还以此谋杀案为由头写了一本《红色的灾祸》，由传教士广为流传。但有人还怀疑它是国民党为了动员

外国舆论反对共产党，指使人干的。到底怎么回事，他想不明，讲不清。

他觉得对中国了解太少，对共产党了解太少。他认为要了解中国共产党，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干什么，传教士谋杀案是不是共产党干的等问题，“就必须到红区去”。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再没有比中国红军更神秘，被传述得更扑朔迷离的了。半封建时代中国的红军在石堡般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已与世隔绝了9年，但他们一直战斗在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腹地。成千上万的敌军如同一堵墙时刻包围着他们，要进入这一地区，比去西藏还要困难。从第一个中华苏维埃在湖南东南部建立以来，还没人愿意穿越这堵墙再返回来写下他的见闻。”

“甚至连最简单的问题也存在着争论。一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只不过是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一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认为这不过是共产党的欺骗而已。但是赤色同情者却称赞红军和苏维埃是治疗中国一切痼疾的良药。在此宣传和反宣传之中，公正的观察家一直苦于缺乏可靠的证据以供证实其真实性。

中国共产党是真的反帝吗？“他们真的想同日本开战吗？”他们的那些言辞激烈的抗日口号，真的是“只不过是赢得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尝试，是叛徒或匪徒最后绝望的呼号”吗？这话是胡适在北京劝说情绪激昂、要求抗日的学生时所说。斯诺听后，提出上述的怀疑。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和军事上前途如何？其发展趋向怎样？能够成功吗？这样的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个有世界五分之一（一些人说是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一旦发生巨大变化，其影响是什么？会使世界政治以及世界历史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它会给英、美和其他国家的在华投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外交政策’？”

“那些已被判了死刑的共产党人，不管是在‘礼貌’的诱导下，还是面对残暴的酷刑，都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尽管他们中间年轻人居多但面对监禁和杀戮，他们坦然处之，这又是什么？

红军是“一支有纪律的中国军队吗？它的士气怎样？军官和一般人住的真是一样吗？”“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红军穿、吃、爱、消遣或工作如何？他们的婚姻法如何？妇女是像国民党政论家所说的那样被‘共产’了吗？”“他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他们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以及‘红色文化’怎样？”

蒋介石已于1935年宣称，“南京已经‘摧毁了共党的威胁’”，为什么在1936年“在中国最有战略地位的西北地区”，红军却占领一大块连成一片的地区？如果红军已经完了，为什么南京与东京签订反共协定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还提出“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克化”呢？

上述一系列问题不但对斯诺以及他的圈里的人，甚至对于西方和全世界都是重要的。他决定冒险到西北了解真实的情况，尽管他认为此举会使他的职业和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但他还是决定去了。

他到陕北采访，可以说是有他从事新闻工作的习惯，也有他的深厚的思想基础。他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正如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所言：“当1936年6月访问红军的时机来到时，斯诺已经通过多年的专业工作进行了很好的准备，这种专业工作不仅是采写新闻，而且是记录中国的历史。

斯诺到陕北调查访问时，正是处于“而立”之年。三十岁是人生道路上重要的时刻，也是一个人处于思想最敏锐的时刻，也是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时刻，何况他又有新闻工作的职业习惯和敏锐观察的辨别能力，又做了大量准备，在现实面前，终于写出了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对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对进步力量、对红军长征予以赞颂，也想明白了、说清楚了萦绕他脑海中的种种疑惑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

斯诺带着“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问题，进入红色区域。

斯诺也带着别人的劝告、警告：当心被共产党谋杀。“蒋介石方面一直把红军称‘赤匪’，还造了许多谣言，说他们如何凶狠残暴，想以此煽动人们对红军的憎恨。”

斯诺通过在红色区域调查访问四个月，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入了解，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

斯诺在引用中共领导人讲话或文章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获得人们的拥护的道理。他说：

“首先，共产党指出，在南京分裂革命的有生力量以后，中国迅速沉沦。”当他正在写《共产党的政策》章节时，报纸上就登载了来自中国中部和西部的骇人听闻的消息：

“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显然已遭多年来最严重的灾馑，已有成千上万人死亡。据最近川灾赈济委员会调查，该省灾区人口三千万，已有数万人食树皮和观音土充饥。据传现有灾民四十余万人，甘肃百余万人，河南约七百万人，贵州约三百万人。贵州灾区遍及六十个县，官方的中央社承认这是百年来该地区最严重的一次灾荒。

“四川省的捐税已经征收到六十年以后了，千千万万亩田地被丢荒，因为农民们付不起捐税和苛暴的地租。我案卷里六年来收集的资料表明，在其他许多省份里也有不相上下的灾害，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些灾害的频率有减少的趋势。”

“共产党宣称，是国民党的‘不抵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加速了农村的破产衰退。”

“南京政府在九年反共中得到了什么呢？西北当局最近在反对筹划第六次反共‘围剿’的声明中总结了这些后果。这使人记起在第一次‘围剿’中，满洲丢给了日本；在第二次‘围剿’中，上海遭到侵犯；在第三次‘围剿’时，热河沦陷；第四次‘围剿’则丢了冀东；而在第五次‘肃清残匪’中，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又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1932年4月，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宣战时，它提出联合抗日。”1936年，共产党提出只要国民党甚至蒋介石，同意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坚决抗日”，“保证人民群众的公民权”，它就同意把“它的红军和苏区统一到国民党政府之下”。因为它认识到反帝反封建两个基本目标中，“争取民族生存”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至关重要的，哪怕要以缓和国内的土地问题上的斗争为代价，也必定要进行”。

斯诺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时，这样写道：“在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时，共产党明确地把日本与友好的非侵略性的民主帝国主义国家区别开来。”共产党赞同取消不平等条约，毛泽东宣称：“对于友邦，中国将通过和平谈判与之订立互利的条约”。他还说：“一旦中国真正赢得独立，合法的外国贸易利益将享有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是一件只由中国独专其利的事，而需要许多国家的参与。我们的千百万人民，一旦真正获得解放，他们的巨大的生产潜力就会释放出来，用于各领域的创造活动上，就能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然而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在过去很少被激发出来，相反，它遭到本国的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

斯诺亲身体会到：“从红军对我的态度中，我从不感受到任何‘排他主义’，他们当然是反帝者，但种族偏见似乎已经转变为不分国界的阶级对抗，甚至他们的抗日鼓动也不是针对在种族意义上的日本人。”

不过斯诺由于当时的思想认识，他把共产党主张国际主义精神的原因，不是归于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是归于“中共领导人在俄国受过教育”之故。

中共对前苏联的态度和政策，斯诺做了如下的报道：“在过去十余年中，俄国确实明显地对中国人思考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有一种强有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和苏联新社会留给中国人民的印象，也许要比所有基督教教会加在一起的影响更深刻。”但是“人们必须切记，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信从，以及与苏联的联合，是出自所愿，随时可由中国人自己解除。苏联对他们最强有力的作用是作为一个带来希望和信心的活榜样。中国红军坚信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正热切地注视着他们，一旦时机来临，就会起而仿效，恰为他们自己效仿俄国同志那样。”“但中国共产党相信，除了他们自己势力所及的小根据地之外，他们还有苏联这个强大的后盾”，“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斯诺说：“在我看来，这些思想已经显示出他们能改变中国人的行为的威力。”不过斯诺说：“中国苏区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在地理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完全与世隔绝，苏联对中国苏区到底有多大意义，颇令任何从不认识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西方人费解。”

斯诺上述的一些报道和看法，已向世界人民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红军到底是什么人，竟能如此长期地、勇敢无畏地战斗？竟如此地不可战胜？“他们经受了无数次战斗、封锁、缺盐、缺粮、疾病和瘟疫，最后进行六千英里的长征，跨越了中国十二个省，突破了成千上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最后胜利地进入西北新的根据地”，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他们从事的这场斗争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希望、目的和梦想使他们成为难以置信的顽强勇士。斯诺提出上述问题后，认为联系中国人以往的妥协历史，“这真是不可思议”。

斯诺的西行，到了红色区域，和红军领导人谈话，和红军战士接触，听苏区人民对红军的称赞，他置信了顽强勇士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他们长征能胜利，能够在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

在他笔下描述了红军到底是什么人，他写道：“约瑟夫·F·洛克博士告诉我，他到云南时与波斯哈德谈过话。”这个美籍的博士与瑞士传教士波斯哈德谈话后，告诉斯诺，说有一次贺龙抓了瑞士传教士波斯哈德，红军的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决”关他18个月。当贺龙开始长征时，波斯哈德牧师的刑期未滿，他被命令随部队一同转移。终于，在征途中他期满获释，还得了一笔路费去了云南。令大多数人惊讶的是，波斯哈德牧师非但没有讲贺龙的坏话，相反，他对贺龙的评论是：“要是农民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样，他们就不会有一人跑走了。”

有一次斯诺问一位十几岁的红军“为什么参加红军？”

那位红军回答：“红军待我们好，我们一回也没挨过打”，“这里人人都一样，不像在白区，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人人打仗都是为了帮助穷人，为了救中国。红军打地主，打白匪，红军打日本，为什么有人不喜欢这样的队伍呢？”